

DOI: 10.12046/j.issn.1000-5285.2018.06.008

· 历史纵横 ·

陈寅恪“突厥旗色尚白”推论考辨

——兼论隋末李渊起兵易帜事件中政治合法性的多元构建

陈寒

(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 福建福州 350117)

摘要: 陈寅恪先生于上世纪50年代所撰《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一文中提出了“突厥旗色尚白”的观点, 此后学界将此视为定论。此问题牵涉李渊集团与突厥的政治、民族关系, 需要结合中古时代的谣谶、术数和政治合法性模式等因素进行综合分析。李渊集团的易帜, 不只是单纯的政治宣示活动, 而且是其起兵反隋活动政治合法性的综合构建过程, 是中古时代思想文化多元性特征的集中体现。

关键词: 李渊; 白旗; 突厥; 政治合法性

中图分类号: D0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285(2018)06-0050-13

隋末大业十三年(617), 以李渊为首的李氏集团自五月甲子日于晋阳积极筹划、宣誓起兵, 至同年冬十一月甲子攻入长安, 李渊为丞相、进封唐王, 完全控制了隋代中枢大权。作为李唐政权创建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 该事件历时半年之久, 其间曲折反复, 枝节横生, 所牵涉的政治、民族、思想文化等诸因素颇为繁杂, 学术界对该事件的探讨一直较为热烈。其中, 陈寅恪于1951年发表的《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一文, 超越了宋代以来史家对此事的简略评价, 发微探幽, 集中对该事件中李渊集团与突厥关系诸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创见颇多, 同时将该问题引入了整个唐初政治史的研究范畴, 为后继者定下了研究基调。其后, 李树桐所做相关系列研究, 在史实订正、挖掘方面使该问题的探讨更为细致和深化。此外, 罗香林、日本学者气贺泽保规、李刚、张耕华等学者也分别从史料分析、宗教因素和治史风格等角度参与了该问题的探讨。^①

收稿日期: 2018-01-02

作者简介: 陈寒, 男, 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副教授, 历史学博士, 近年主要研究政教关系、中古宗教与文化等问题。

^① 陈寅恪:《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岭南大学学报》11卷第2期(1951),第1—9页(后收入《寒柳堂集》,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108—121页)。李树桐所著《唐高祖称臣于突厥考辨》《再辨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三辨唐高祖称臣于突厥》《唐太宗渭水之耻本末考实》《李唐太原起义考实》等系列文章,分载“大陆杂志史学丛书”第二辑第二册《唐宋附五代史研究论集》,台北:大陆杂志社,1967年,第92—104页;“大陆杂志史学丛书”第三辑第二册《秦汉中古史研究论集》,台北:大陆杂志社,1970年,第262—280页;《唐史索隐》,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1—31页;“大陆杂志史学丛书”第二辑第二册《唐宋附五代史研究论集》,台北:大陆杂志社,1967年,第217—228页;第一辑第四册《秦汉史及中古史前期研究论集》,台北:大陆杂志社,1967年,第216—229页。罗香林:《大唐创业起居注考证》,《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集刊》第二期(1936),第115—141页。日本学者气贺泽保规所著《〈大唐创业起居注〉的性格特点》,载《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六朝隋唐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212—243页。李刚:《唐高祖创业与道教图谶》,《宗教学研究》1998年第3期,第15—21页;《唐太宗与道教》,《晋阳学刊》1994年第5期,第66—70页。张耕华:《陈寅恪、吕思勉治史风格的异同——以唐高祖称臣突厥之考辨为例》,《学术月刊》2013年第2期,第132—140页。

在此探讨中，陈寅恪最早提出了“突厥旗色尚白”的观点，并一直为学界所沿用，几成定论^①。该观点的形成主要源于两条史料。

其一，为《大唐创业起居注》（以下正文中均略称为《创业注》）卷三所载裴寂等所奏神人太原慧化尼歌谣诗讖中的“童子木上悬白幡，胡兵纷纷满前后”^②。陈氏认为“是胡兵即突厥兵，而其旗帜，为白色之明证。此歌谣之意，谓李唐树突厥之白旗，而突厥兵从之”^③。此为陈氏所持观点的直接证据。

其二，《创业注》卷一载李唐起兵之初旗幡以白色“兼以绛，杂半续之”，“赤白相映若花园”^④。此事《资治通鉴》中所载略同，“移檄郡县，改易旗帜，杂用绛白，以示突厥”。其下胡三省注曰，“隋色尚赤，今用绛而杂之以白，示若不纯于隋”^⑤。而陈氏则认为，李唐此举“实表示维持中夏之地位而不纯臣服于突厥之意”^⑥，正是从“唐高祖称臣于突厥”这一观点出发来对李渊集团使用赤白相杂旗色的动机进行揣测，从而得出其中的白色为突厥旗色的间接证明。

以上对于陈氏观点的展示中可知，其证据主要来源于李渊起兵之初对于谣讖的利用和对突厥关系两个方面，而尤其强调后者，对于谣讖、纬候等政治神秘主义元素在当时社会政治活动中的影响并未深究，仅仅视之为“史家铺陈开国祥瑞之惯例”^⑦，这与陈文以“李渊称臣于突厥”为研究视角和目的是分不开的。

然而翻检史籍可知，与李渊起兵易帜有关的记载并不止陈文所举的两处证据，且与其易帜有关的原因也不仅仅限于所谓“称臣于突厥”的关系，还包括对于“桃李子”等谣讖的利用、对于“甲子”吉日的术数迎合、对于“武王伐纣”正义性模式的借鉴等等方面的内容。即便是单纯从李渊集团对突厥关系的角度考虑，也还有着李渊集团战略重点的选择、对突厥策略性利用等问题，而不是仅仅通过非此即彼地判断其是否“称臣于突厥”，进而断定其所树白旗之缘由这么简单。因此，李渊起兵易帜问题其实颇为复杂，牵涉原因颇多且相互纠葛，下文即从上述各角度加以综合探究。

关于李渊起兵易帜的资料，以《创业注》所载最为详细，且多被以谣讖的形式，故以此角度展开分析。

谣讖，从功能上讲其属于讖语一类，具备“诡为隐语，预决吉凶”^⑧的基本特征，其出现由来已久，可追溯至春秋之时。如《国语》所载“风听庐言于市，辨祲祥于谣”^⑨，即通过对民间传闻的了解来侧面证明或预测国家政治的兴衰走向和统治者的善恶得失。谣讖的出现，成为了自古以来社会中统治者政治合法性的重要证明方式（无论是为了受命抑或革命），它来源于阴阳五行、占卜术数等古

① 如上所列诸研究中，除李树桐和气贺泽保规对“突厥旗色尚白”之论有所反驳和质疑外，余者均将此视为定论或直接借用为论述之证据。此外，与唐初历史相关的其它论著中亦多引用此论，兹不一一列出。

② [唐]温大雅撰：《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三，李季平、李锡厚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56页。

③ 陈寅恪：《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寒柳堂集》，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113页。

④ 《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第11页。

⑤ 《资治通鉴》卷一八四，“隋纪八·义宁元年六月”，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5738页。

⑥⑦ 《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寒柳堂集》，第114、112页。

⑧ [清]纪昀：《四库全书总目》卷六，“易纬坤灵图”//文渊阁影印《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册，第158页。

⑨ 徐元诰撰：《国语集解》卷十二，“晋语六”，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第388页。吴人韦昭于此注曰，“辨，别也。祲，恶也。祥，善也。徒歌曰谣，‘丙之辰’、‘靡弧箕服’之类是也”。“丙之辰”，指晋献公以伐虢问卜偃之事；靡弧箕服，指西周末褒姒之事。此二事的共同特点不仅在于时间上较早出现，且均以民间童谣为传播渠道（如“童谣有之曰”，“童女谣曰”）。

代传统的基本知识系统,与纬候一同对中古政治施加着神秘化的影响,但谣讖又采取了上古时代特有的谣谚传播方式,从而具有较好的传播有效性,强化了其社会影响的范围和深入程度。谣讖的流行盛于两汉,而延续影响至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从其流传数量和影响深度、广度的历史分布中可清晰看出^①。同时谣讖所采用的谣谚的传播手段也与中古时代前期的社会文化背景、知识传播方式有着密切关系^②。及至隋唐以降,新谣讖的创制渐趋停顿^③,但谣讖的流传之风却并未减弱,只不过更多的是将南北朝以来流行的谣讖加以改造和借用罢了^④。

隋末社会动荡,各种矛盾日益尖锐,政治异动暗流翻涌,此时统治者对于谣讖已不可能再泰然处之了。隋炀帝除了“发使四出,搜天下书籍与讖纬相涉者皆焚之”^⑤之外,对于其时社会上流行的“白衣天子出东海”、“李氏将兴”等谣讖也颇为留意,或着意趋附之以应符命,试图再次获得上天所赋予的政治合法性(详见下引“白旗天子”讖语),或猜忌李姓臣属,甚至大行杀戮^⑥。而与此相应的,则是在具有政治野心的贵族官僚、割据豪强等等构成的政治集团之中也有着谣讖、符命的散播和流行。这些集团出于政治野心 and 实际活动的需要,都急需获得上天所赋予的政治合法性和神秘化的社会号召力,而各类谣讖则有着巨大的现实功效。需要注意的是,谣讖的现实政治指向和实际功效才是谣讖的根本存在意义——而不论其是否文辞粗鄙抑或荒诞不经,至于其采用佛教的、道教的还是阴阳五行学说则仅仅是谣讖的文化外衣,用以增强其历史渊源和文化色彩而已^⑦。

李渊集团自起兵南下直至攻破长安、夺取政权,始终利用着谣讖,以发挥其宣示天命和鼓舞士气的巨大作用。这些谣讖按照其出现和使用的时间不同,可分为“受命讖”和“劝进疏引讖”两部分,散见于《创业注》,而关于易帜的记载亦屡现其中。受命讖,主要出现在李渊集团起兵的前夕,正是其宣示起事的政治合法性、鼓舞人心、聚集军事力量的关键时刻。劝进疏引讖则是李渊称帝前以裴寂为首所进的讖语,其中回顾了李氏起兵以来所现的种种祥瑞异相,相较受命讖而言指向更加明显,直接为李渊称帝张目。受命讖共五条,可分为“白衣(或白旗)天子之讖”和“桃李子歌”两类。劝

① 清人杜文澜所辑《古谣谚》一书对文献中所载的谣谚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整理。该书的“凡例”部分对谣谚的概念定义、属性特征以及其在文献中的呈现特点等均有着细致深刻的见解。从该书依据四部所进行的梳理辑录中可知,谣讖或接近于谣讖的内容主要分布于史部,且以两汉直至魏晋南北朝的第四—十一卷最为丰富,而其次的子部中也以该时间段最为集中。参见周绍良点校:《古谣谚》,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

② 谣讖的传播主要通过谣谚实现,而其中尤以童谣的形式最为重要和典型。究其原因,实与上古以来社会文教普及程度的欠缺所导致的神秘主义流行以及文化传播模式粗糙有着重要关系。对于以童谣形式传播的谣讖,古人认为,“凡五星盈缩失位,其精降于地为人,……荧惑降为童儿,歌谣嬉戏,……吉凶之应,随其象告”(《晋书》卷十二,“天文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20页)。又,杜预认为,“童叟之子,未有念虑之感,而会成嬉戏之言,似若有凭者。其言或中与否,博览之士、能惧思之人,兼而志之,以为鉴戒,以为将来之验,有益于世教”(《春秋左传注疏》卷十二,“僖公五年”,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795页)。此即从其神秘的理论来源和实际的社会功用方面予以了深刻揭示。

③ 故有研究者将隋唐以后视为谣讖的萎缩和平流期,并认为造成该现象的主要原因是隋代统治者对讖纬之学的禁毁(见柏莲子(谢贵安):《中国讖语文化:古代预言全书》,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347—353页)。然而中古时代的统治者对于图讖纬书的打击和禁毁活动是始终不断的,南朝时的宋、梁,北魏太武帝时期都曾严令禁图讖及阴阳方伎之书,但并未对谣讖的流行造成根本性的影响。因此,新谣讖创制的停顿这一现象或可从隋唐以降社会文化环境的变化(如文化教育的渐趋普及)、社会思潮的转变(如从神秘主义的弥漫转而趋向于儒家理性主义)、讖语形式的转变(从谣谚等民间的零散传播转而而为《推背图》等系统的文人撰述)等角度加以解释。

④ 如“李氏将兴”、“白衣天子出东海”、“黑衣之讖”等等。参见姜望来:《谣讖与北朝政治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

⑤ 《隋书》卷三二,“经籍志”,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941页。

⑥ 如因之诛李金才一族,事见《隋书》卷三十七,“李穆附李浑传”,第1120—1121页。又[宋]王谠《唐语林》卷四“贤媛”条载,“炀帝以图讖多言姓李将王,每排斥之(李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49页)。罗香林亦指出“李氏将兴”之类的谣讖,“在当时实为一种足资号召或取祸之口实”(《大唐创业起居注考证》,第24页)。

⑦ 正如《资治通鉴》胡注评价“虞季才劝隋王以甲子应天命”一事所认为的,“虞季才持正于宇文护擅权之时,而劝进于杨氏革命之日。巫史之学,自信其术耳,非胸中真有所见也”(《资治通鉴》卷一七五,“陈纪九”,第5432页)。

进疏引讖共六条。下面分别加以分析。

(1) 法律存，道德在，白旗天子出东海

《创业注》于此条后载隋主（炀帝）曾有白衣事道以应此讖之事^①。

“白衣之讖”自南北朝以来即颇为流行，其由来及其宗教文化特征，历来学者颇多争论。^②对于谣讖，既要进行历史性的文化渊源追溯，又不能拘泥于此而忽视其神秘性、模糊性的文本特点和现实的政治指向功能。从此处对于“白衣之讖”的利用来看，将其溯源于民间宗教形态的弥勒教并不符合隋炀帝或李渊对于天命延续或转移的正统性追求，而从高齐时代的“东海出天子”讖语进行地域性、佛教属性的延伸性解释也颇显牵强，与李渊集团初起时的政治活动和集团组成等特点并不吻合^③。

从隋主曾白衣事道一事来看，这里的“律令”、“以彩画五级木坛自随以事道”，以及“法律”、“道德”等名词，说明该谣讖具有道教的文化特征。隋主当指炀帝，其与道教的关系以及大业年间召集道士进行章醮活动等事，学者已有论述。^④此外，结合李渊集团起兵前后的活动来看，其与道教联系（如与楼观道派的关系、《创业注》中对兴国玄坛和老君像的记载、道士对起兵活动的支持等等）的紧密程度要远远胜过佛教，或可旁证此处白衣或白旗之讖具有道教文化之色彩^⑤，或被附以道教色彩而使用。此外，翻检史籍，白旗除作为军事号令的调度之用外，其它用途及相关谣讖均较为罕见。故可推测，此讖或为自传统的“白衣天子”讖语篡改而成，添加了“太原童谣”的现实传播方式，以“白旗之讖”为李渊集团的起事制造声势。^⑥

(2) 桃李子歌：桃李子，莫浪语，黄鹤绕山飞，宛转花园里。^⑦

《创业注》于此条后载：“李为国姓，桃当作陶，若言陶唐也；配李而言，故云桃花园，宛转属旌幡。……帝每顾旗幡，笑而言曰：‘花园可耳，不知黄鹤如何。吾当一举千里，以符冥讖。’”^⑧

“桃李子歌”在李渊起兵事件中的具体所指上述甚详。然而结合其它版本来看，其中包含的因素

① 《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载：“常亦云：‘白衣天子’。故隋主恒服白衣，每向江都，拟于东海。常修律令，笔削不停，并以彩画五级木坛自随以事道。”（第11页）

② 主要有唐长孺所持的弥勒教观点（唐长孺：《白衣天子试释》，《燕京学报》第35期，1948年，第227—238页），气贺泽保规等日本学者所持的道教观点（见《〈大唐创业起居注〉的性格特点》一文），以及姜望来所持佛教观点。上述观点的结论可参见姜望来：《谣讖与北朝政治研究》，第195—198页。

③ 对于“白衣之讖”的各种解释中，无论是弥勒教、道教还是佛教的观点，均有其可取之处，但如果从该讖语的历时性变化来看，则各个观点均不无牵强之处。具体到隋末来看，弥勒教、“白衣会”与天命的正统性的冲突、对于“白衣野老”和“东海”的解释、对于讖语制造者灵远、慧化尼宗教身份的判定等等问题，都使得明确该讖语的宗教类别属性十分困难。

④ 李刚：《隋炀帝与道教》，《世界宗教研究》2006年第1期，第45—54页。至于炀帝于江都的事道活动是否确为金齋斋，则因资料的简略而不甚明了。另据《魏书》卷一四，“释老志”，北魏太武帝时“起天师道场于京城之东南。重坛五层，遵其新经之制。给道士百二十人衣食，齐肃祈请，六时礼拜，月设厨会数千人。”（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053页）从炀帝行道所用“五级木坛”推测，其活动或许与新天师道有关。

⑤ 另，气贺泽保规文中也得出了“白衣之讖”具有道教色彩的结论，但论据之一的“霍太山神”问题，姜望来的著作中已论迷得很透彻，此不赘言。而另一论据“神人慧化尼”问题中，“神人”并非指代僧尼的常见称谓，也非道教专有名称，其含义当指具有神异、神通的人或非人，故此论据亦较为牵强。

⑥ 陈寅恪亦提出李渊集团将旧有谣讖中的“白衣”改为“白旗”的看法，但并未重点阐发，且其认为是由李世民等加以篡改，史无明证。

⑦ “桃李子歌”还有其它三种不同版本。《隋书》卷二二“五行志上”载：“大业中，童谣曰：桃李子，黄鹤绕阳山，宛转花木里。莫浪语，谁道许。”（第639页）此条《资治通鉴》卷一八三“隋纪·炀帝下”又作：“有桃李章曰：桃李子，皇后绕扬州，宛转花园里。勿浪语，谁道许。”（第5709页）《旧唐书》卷三七“五行志”载：“隋末，有谣云：桃李子，洪水绕杨山。”（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375页）[明]陶宗仪《说郛》卷一〇下引《迷楼记》载“李花谣”：“大业九年，帝将再幸江都。有迷楼宫人抗声夜歌云：江南杨柳谢，江北李花荣。杨花飞去落何处，李花结果自然成。”（《说郛三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5102页）

⑧ 《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第11页。

则不仅仅指向李渊及其起事活动。如《隋书·五行志》和《通鉴·隋纪》中所载,则包含着隋末李密(以及宇文化及)的起事反隋事件,而《说郛》中所载“李花谣”则更是从大的视野预测了杨隋政权的政治命运。但无一例外,其中都强调了李氏在反隋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和影响,因此我们可以推測此种“桃李子歌”和长久以来颇为流行尤其在隋末更为活跃的“李氏将兴”的道教谣讖有着密切关系^①,而李渊正是借此谣讖的历史渊源(“李氏将兴”)和现实指向(“桃李子歌”)来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的。

因此,“白衣之讖”和“桃李子歌”并非李渊集团易帜之原因,而是其借助于谣讖的文化渊源和传播特点以扩大“易帜”影响力的重要手段。从李渊集团起兵之初的活动来看,此二讖语内涵的神秘魅力和传播上的迅捷特点对李渊集团的现实实力扩张有着极大的帮助。

《创业注》载:“康鞘利将至,军司以兵起甲子之日,又符讖尚白,请建武王所执白旗,以示突厥^②。……诸军稍幡皆放(仿)此。营壁城垒,幡旗四合,赤白相映若花园。……自尔已后,义兵日有千余集焉。二旬之间,众得数万”^③。

李渊起事之前,能够直接调动的兵力较为有限,故在大业十三年(617)五月丙寅(十七日)突厥突袭太原的战役中,不但大摆空城计,还不得不冒险派遣王康达、杨毛等抄袭突厥、夺取马匹以充军用。五月己卯(三十日)^④,李建成、李元吉到达太原,使李渊免除了后顾之忧,彻底下定了起事的决心。于是李渊集团“兴义兵以檄郡县”^⑤,并遣使联络突厥,开始了开府建军等起兵入关前的最后准备工作。其始树立白帜,当于此时至六月甲申(五日)出兵西河、初试兵锋的四五天时间。此后亦不断扩军,故“二旬之间,众得数万”。至七月癸丑(五日)李渊集团正式起兵时,兵力为“甲士三万”^⑥。其兵力的扩充、实力的壮大,主要依靠收拢各方势力(如辖内州郡兵、府兵和“贼帅”等),以及利用各种借口和手段公开招募士兵^⑦。如利用刘武周进据汾源宫事件而募得数千兵士,这些兵士即是随后成为其起事核心力量之一的兴国寺兵。

因此,上述谣讖不仅通过其固有的民间传播方式发挥着宣传鼓动作用,更被李渊集团以营垒赤白相映的形式加以具体化和形象化,进一步扩大了其影响范围,强化了其宣传效果。

劝进疏引讖六条:

- (1) 东海十八子,八井唤三军。手持双白雀,头上戴紫云。
- (2) 丁丑语(与)甲子,深藏入堂里。何意坐堂里?中央有天子。
- (3) 西北天光照龙山(昭),童子赤光连北斗,童子木上悬白旛,胡兵纷纷满前后。拍手唱堂堂,驱羊向南走。
- (4) 胡(兵)未济汉不整,治中都护有八井。
- (5) 兴伍伍,仁义行,武得九九得声名。童子木底百丈水,东家井里五色星。我语不可

① 关于“李氏将兴”谣讖的问题,学者们多有留意,并指出了其源出于东晋以来流传的“李弘降世为王”的讖语,而其理论来源则是道教经典《老君音诵诫经》《老君变化无极经》和《太上洞渊神咒经》。汤用彤最早在《康笈札记》“‘妖贼李弘’条”中关注了此问题(《汤用彤全集》第七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3页),唐长孺在《史籍与道经中所见的李弘》一文中对此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08—217页)。此后,方诗铭在《释“张角李弘毒流汉季”》(《历史研究》1995年第2期,第40—51页)一文中,认为所谓的“老君当治,李弘应出”,是原始道教教派李家道长期传播的讖记,自汉末直至北魏,原始道教起义多以此为号召。

② 关于此句中“以示突厥”的具体含义,本文的认识与陈寅恪不同,详见后文。

③⑤ 《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第11、10页。

④ 《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第10页)作“六月己卯”,六月无己卯日,当为五月己卯,即五月三十日。

⑥ 《资治通鉴》卷一八四,“隋纪八”,第5741页。

⑦ 关于隋唐时期兵募制度存在的普遍性及其重要作用,唐耕耦在《唐前期的兵募》一文中所论颇详(见《历史研究》1981年第4期,第159—172页),同时其认为,李渊起事军队的构成,除其统辖的原有的隋军外,再就是其起事前临时招募的军队。

信，问取卫先生。

(6) 戊亥君臣乱，子丑破城隍，寅卯如欲定，龙蛇伏四方。十八成男子，洪水主刀傍，市朝义归政，人宁俱不荒。人言有恒性，也复道非常，为君好思量，何□□禹汤。桃源花□□，李树起堂堂，只看寅卯岁，深水没黄杨。

此六条谶语是为向李渊劝进而编造的，因而充分地强调了其应符谶、得天命的政治优势，并对其起兵过程中的一些事迹进行了神秘化的描述。其中，条3与易帜直接相关，为陈氏立论的证据。

气贺泽保规对上述六条谶语进行了分析^①，对其中所暗指的“李渊”、“李唐”、“杨隋”以及与李渊起兵事件相关的时间（纪年干支）、祥瑞等问题都有所揭示，此处不再赘述。唯条5中的“武得九九得声名”，气贺泽保规认为是暗指李渊八十一天左右的起兵历程，颇显牵强^②。此条谶语中的“九”当是周易所谓的天数和极阳之数，“九九”则暗指干支之首的甲子，与条2中的“丁丑语（与）甲子”（指李渊重要的军政活动多于大业十三年丁丑年的甲子日进行）均与李渊集团易帜有着重要的关系。

二

《创业注》卷三载，李渊认为甲子为吉日（“甲于五行为木，木加于子，□□□良日”），“故自起军，逮乎人相登极，咸用甲子焉”。^③然而，以甲子附会于李氏而主吉，只是李渊集团“咸用甲子”的原因之一，更深层原因则在于甲子的术数意义。

中古时代，政治生活和中所弥漫的神秘主义色彩，除表现在上文中的以谶语形式的传播外，纬候之学也为之提供了丰富的理论依据。其中，“甲子”即被赋予了多重神秘的内涵而在中古政治舞台尤其是政权兴替之际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其原因在于，“甲为六甲之始，子为十二辰之初。甲数九，子数又九，九为天数”^④，因此在依据术数之学进行吉时的推算中，甲子成为首选。

甲子年的意义往往体现在“上元年”之中。所谓上元，古人认为，“夫理历之本，必推上元之岁，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连珠，夜半甲子，朔旦冬至”^⑤。又，《新五代史》载，“夫天人之际，远哉微矣。而使一艺之士，布算积分，上求数千万岁之前，必得甲子朔旦、夜半冬至，而日月、五星皆会于子，谓之上元，以为历始”^⑥。因此，理想中的上元须具备甲子年、冬至甲子日朔和日月五星会聚的诸多条件，实属难得，被认为是天命归属、除旧布新的伟大象征。如，隋代的袁充就进行过上元的推算：

仁寿四年甲子岁，炀帝初即位，（袁）充及太史丞高智宝奏言：“去岁冬至，日景逾长。今岁皇帝即位，与尧受命年合。昔唐尧受命四十九年，到上元第一纪甲子，天正十一月庚戌冬至；陛下即位，其年即当上元第一纪甲子，天正十一月庚戌冬至，正与唐尧同。自放勋以来，凡经八上元，其间绵代，未有仁寿甲子之合。谨案：第一纪甲子，太一在一官，天目居武德，阴阳历

① 气贺泽保规：《〈大唐创业起居注〉的性格特点》//《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六朝隋唐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230—231页。

② 气贺泽保规认为，这八十一日是指“从五月甲子（十五日）起义至八月辛巳（三日）攻下霍邑，或从七月癸丑（五日）太原出兵到九月壬申（二十四日）攻占冯翊郡旧宅前后”（《〈大唐创业起居注〉的性格特点》//《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六朝隋唐卷》，第231页），所选择的时间点中，如攻占霍邑和冯翊郡旧宅并不具有代表性的重大政治意义，且整体时间估算较为随意。

③ 如，大业十三年（617）五月甲子，收王威、高君雅系狱，易反隋之白旗；七月甲子，得霍山神谕，后破宋老生，扫清南下强敌；义宁元年（617）十一月甲子，李渊为丞相，进封唐王；义宁二年（618）五月甲子，改元武德，建立唐政权。

④ 《隋书》卷七八，“庾季才传”，第1766页。

⑤ [唐]傅仁均：《对王孝通驳历法议》//《全唐文》卷一三三，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344页。

⑥ 《新五代史》卷五八，“司天考”，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669页。

数,并得符同唐尧。唐尧丙辰生,丙子年受命,止合三五,未若己丑甲子,支干并当六合。允一元三统之期,合五纪九章之会。共帝尧同其数,与皇唐比其踪。信所谓皇哉唐哉,唐哉皇哉者矣。^①

现实当中,挑选出完全具备各种条件的上元年是很困难的,因此古代的历算家往往运用九星术或太乙九宫术进行上元年的推算和解释^②。袁充所谓“太一在一宫(乾),天目居武德(申)”,即是运用九宫术说明仁寿四年上元岁君臣各居其位,阴阳调和,且在个人命数上炀帝胜于唐尧,从而为炀帝继位进行受命于天的合法性解释。

同样在吉日的选择上,甲子也具有重要意义。庾季才在北周末年(大定元年正月)向杨坚劝进,在吉日的选取上他建议:

“二月日出卯入酉,居天之正位,谓之二八之门。日者,人君之象,人君正位,宜用二月。其月十三日甲子。甲为六甲之始,子为十二辰之初。甲数九,子数又九,九为天数。其日即是惊蛰,阳气壮发之时。昔周武王以二月甲子定天下,享年八百。汉高帝以二月甲午即帝位,享年四百。故知甲子、甲午为得天数。今二月甲子,宜应天受命。”^③

卯酉为地平方位标志,是春秋二分太阳出没地平的方位。古人认为,“卯酉为日月所行之中道,是万物盛衰出入之所,号为二、八之门,以当二、八月分”^④。《诗·推度灾》曰:“卯酉之际为革政”。^⑤故庾季才认为二月主吉,利于改朝换代。甲子为天数,且时当惊蛰,故符合政治上除旧布新的需求。又因为该年闰二月,于是庾季才援引周武王、汉高祖之例,为杨坚提供了二月甲子、闰二月甲午两个吉日。

翻检史籍可知,整个南北朝时期,尤其在北方^⑥,统治者在进行改朝换代或者做出重大决断(尤其是战争)时,不但进行符谶祥瑞的“天命”舆论营造,而且更加注重“甲子”所具有的九九天数、除旧布新的神秘化天命寓意和“武王伐纣”所蕴含的“吊民伐罪”的政治化天命寓意(即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合法性)。兹列史实于下。

(元熙二年六月)甲子,(晋恭)帝逊于琅邪第,百官拜辞,秘书监徐广流涕哀恸。^⑦

(西魏孝闵帝元年九月)甲子,群臣上表劝进,备法驾奉迎。帝(宇文毓)固让,群臣固请。是日,即天王位,大赦天下。^⑧

(大象二年十二月)甲子,周以大丞相(杨)坚为相国,总百揆,去都督中外、大冢宰之号,进爵为王,以安陆等二十郡为随国。赞拜不名,备九锡之礼。^⑨

开皇元年二月甲子,上(杨坚)自相府常服入官,备礼即皇帝位于临光殿。^⑩

以上可知,南北朝时期,在发生改朝换代,尤其是权臣主导的“禅代”之时,政治权谋和手段是决胜的根本,传统的政治伦理已无法对此种实际上的“篡逆”行为进行合理化的解释,利用甲子

① 《北史》卷七四,“袁充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555页。

② 详见陈遵娣:《中国天文学史》(第三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655—1663页;卢央:《中国古代星占学》,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第471—472页。

③ 《隋书》卷七十八,“庾季才传”,第1766页。

④ 卢央:《中国古代星占学》,第339页。

⑤ 《太平御览》卷六〇九,“学部三·诗”,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2740页。

⑥ 南朝统治者亦采用符谶祥瑞,但对于“甲子”术数卜筮层面上的讨论则较北方要少得多。此现象或可归因于南北方学术风气上的差异。正如唐长孺所指出的,“杂以谶纬占候,实为北方经学的一个特点”(见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28页)。

⑦ 《资治通鉴》卷一一九,“宋纪一”,第3734页。

⑧ 《周书》卷四,“明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53页。

⑨ 《资治通鉴》卷一七四,“陈纪八”,第5430—5431页。

⑩ 《隋书》卷一,“高祖纪上”,第13页。

的神秘寓意，以天数的影响、天命的转移来标榜“禅代”的政治合法性就显得十分必要了。如晋恭帝逊位与刘裕之年，即发生了“填星犯太微”的天象^①，而隋炀帝登基之时袁充对于甲子和上元的解释，更较为典型地体现了中古时代神秘政治文化的理论依据和诠释逻辑。^②因此，李渊任丞相和登基的甲子日的选择，与隋文帝相似，这必定不是时间上的巧合，而是出于对术数理论的迎合和对杨隋政治活动轨迹的模仿。^③

义宁二年（618）四月，裴寂等人向李渊上《劝进疏》，其中论证李渊登基的合法性时提到，“甲子之旦，不俟而（脱），起兵西北，势合乘乾。我来自东，位当出震”^④。虽有脱文，但基本含义是清晰的，即以“乘乾”来证明李渊具有称帝的天命，以“出震”来证明起兵反隋、夺取关中的合法性。

按太乙九宫分野来看，“一宫在乾，主冀州、并州。若文昌将关囚，必有迫胁君父之象矣”^⑤。象征君主的乾宫在九宫中居于西北位，其对应的地域为冀州和并州，而天目文昌若也居于乾宫君位，则有着辅臣代君的重要意义。故李渊起兵于太原，在传统地域划分上属并州，具备了符合“西北”和“乘乾”的天命要素。然而，从传统地理观念上来看，将并州归入西北区域还是不太合理的。《创业注》中又对此的解释是，“大业初，帝为楼烦郡守，时有望气者云：‘西北乾门有天子气连太原，甚盛。’故隋主于楼烦置宫，以其地当东都西北，因过太原，取龙山风俗道，行幸以厌之云”^⑥。此处以楼烦、太原位于东都西北方的解释略显牵强，但也完成了对“文昌关囚乾宫”的现实的印证。

此外，李渊集团于甲子之旦起兵（以及其它重大时刻对甲子的采用），甲在五行上属木属东方震位，加之起兵之地太原位于杨隋核心关中的东方，故与“我来自东，位当出震”相合。《易卦》所谓“乾为天子，震为诸侯，而在乾上。君臣易位，犹大臣强壮，若天上有雷”^⑦，对于杨隋而言，李氏的起兵也符合“乘乾出震”、“君臣易位”的天命昭示。

“甲子”不仅具有术数层面上的天命昭示的意义，在历史上的政治变动中也往往被与“周武伐纣”这一正义性政治范例相联系。究其原因，“禅代”之际的政治合法性，既可通过术数天象直接获取，却也无法回避对于传统政治伦理的合理诠释，毕竟神秘的天命最终还是要服务于现实的政治目的。这种神圣与现实、天命与王权的联结，所依靠的就是“德”了，正所谓“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在以天命为中心、以受命—革命、道德心性—普遍王权主义诸关系为构成要素的中国传统政治伦理关系结构中，“儒教结构中的圣人正义论就构成了宗教构成之中的一个能动的精神逻辑关系，象征着一个贯串始终的天道，在受命与革命的逻辑之间进行前后左右的平衡和调节”，“以圣人崇拜为中心的道德心性却能够凸现于这个结构之外，又能够作为受命的先赋性前提而嵌入在这个普遍王权主义结构的内核之中，……而有德有位的普遍王权主义结构也无法不继续利用这个圣人正义论对于世俗权力的证明功能”^⑧。此说颇得中国传统政治伦理之精髓。但同时我们必须看到，圣人正义论所具有的平衡调节的能动作用除体现在道德心性和政治伦理上的正义性之外，并未对各种宗教的神秘的因素

① 《晋书》卷十三，“天文志下”，第387页。

② 孙英刚在《“朔旦冬至”与“甲子革命”：历法、讖纬与隋唐政治》一文中对“甲子”、“上元”的历法背景、神秘寓意及其在隋唐政治中的作用与影响做了深入的阐释，见《唐研究》第18卷，2012年，第21—48页。

③ 武德初，傅仁均受高祖命改订旧历，将武德元年定为上元年，其重要依据之一即为李渊于甲子日登基。见《旧唐书》卷七九“傅仁均传”载：“今大唐以戊寅年受命，甲子日登极，所造之历，即上元之岁，岁在戊寅。命日又起甲子，以三元之法，一百八十去其积岁，武德元年戊寅为上元之首，则合璧连珠，悬合于今日。”（第2710—2711页）

④ 《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三，第55页。

⑤ [唐]王希明：《太乙金镜式经》卷二，“推九宫所主法”//文渊阁影印《四库全书》，第810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872页。

⑥ 《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第5页。

⑦ 《春秋左传注疏》卷五十三，“昭公三十二年”，第2128页。

⑧ 李向平：《信仰、革命与权力秩序——中国宗教社会学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78页。

形成超越,其与天命沟通的完成仍需借助于后者,这样一来,神秘因素对于圣人正义论一天命之间的逻辑关系起到了很大的扰乱作用,即神秘因素的感得是来源于圣人还是天命,其作用是昭示天命抑或彰显圣人。因此,圣人正义论的完成,除了从个人和政治伦理层面进行适度解释外,更大程度上要依靠对于自身所拥有的“德”的不断强调和对于传统正义性范例的继承、比附。

对于自身“德”的强调,历代统治者都是极为看重的。而在起兵反隋的过程中,李渊除设置绥德尉等官职以示“绥抚以德”外,尤其在天降祥瑞时自谦以“寡德”,这其实是对自身以德而奉承天命的强调。如:

(八月)辛丑,太原获青石,龟形,文有丹书四字,曰“李治万世”,齐王遣使献之……于是内外毕贺。帝曰:“上天明命,赐以万吉。恭承休祉,须安万方。孤以寡德,宁堪预此。既为人下,不容以之颁告。宜以少牢祀石龟,而爵送龟人,用彰休庆。”

(九月庚午,将渡渭津,苦于水浅,忽然觉水暴长数尺,逆流而上,得达津次。)众咸骇异,以为光武滹沱之冰,无以异此,并于舟中拜贺。帝曰:“此偶然耳,吾何德以堪之!”^①

在实际的军政行动中,若无神秘性因素的支持,内涵模糊的“德”对于正义性的昭示作用是极为有限的,这时对传统正义性范例加以继承和比附,才能有效地将敬天受命、吊民伐罪的正义大旗高高祭起,以鼓舞人心,赢得胜利。而最具历史传统、符合政治伦理和正义性理想的可借鉴范例则非“周武革命”莫属了。

早在战国时期就已出现了将甲子日起兵与武王伐纣结合起来的正义性战争构想,如张仪曾说赵王,“今秦有敝甲凋兵,军于滹池。愿渡河踰漳,据番吾,会邯郸之下,愿以甲子合战,正殷纣之事”^②。至十六国时期,前秦“丁卯围邺,(王)猛上疏称,臣以甲子之日大歼丑类(胡三省注:谓甲子之日克胜,事同周武王克纣)”^③。后,(北魏道武帝皇始二年九月)“甲子晦,帝进军讨之(后燕),太史令晁崇奏曰:‘不吉。’帝曰:‘其义云何?’对曰:‘昔纣以甲子亡,兵家忌之。’帝曰:‘纣以甲子亡,周武不以甲子胜乎?’崇无以对。”^④至隋时,“甲子,隋以出师(陈),有事于太庙。”^⑤。

此外,在战事结束后也会进行正义性的评价和追认。如北周武帝平齐后,与齐地大儒熊安生进行过关于此役的评价。武帝“谓之曰:‘朕未能去兵,以此为愧。’安生曰:‘黄帝尚有阪泉之战,况陛下龚行天罚乎?’高祖又曰:‘齐氏赋役繁兴,竭民财力。朕救焚拯溺,思革其弊。欲以府库及三台杂物散之百姓,公以为何如?’安生曰:‘昔武王克商,散鹿台之财,发巨桥之粟。陛下此诏,异代同美。’高祖又曰:‘朕何如武王?’安生曰:‘武王伐纣,悬首白旗。陛下平齐,兵不血刃。愚谓圣略为优。’高祖大悦。”^⑥

而李渊在起兵之前,亦将李氏图谋反隋之事与周文王、武王事迹相比附。如《创业注》载,李渊曾因攻击突厥不力,为炀帝所遣司直驰驿系狱,即私谓李世民曰:

隋历将尽,吾家继膺符命,不早起兵者,顾尔兄弟未集耳。今遭姜里之厄,尔昆季须会盟津之师,不得同受孥戮,家破身亡,为英雄所笑。^⑦

另,在组织军队,名之为“义士”时,李渊强调其名之所由:

昔周武克殷,义士非其薄德。况今未有所克,敢忘义士者乎!^⑧

①⑦⑧ 《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第31、34、4、12页。

② 《资治通鉴》卷三,“周纪三”,第5885页。

③ 《资治通鉴》卷一〇二,“晋纪二十四”,第3235页。

④ 《魏书》卷二,“太祖纪”,第30页。

⑤ 《资治通鉴》卷一七六,“陈纪十”,第5497页。

⑥ 《周书》卷四五,“熊安生传”,第813页。

因此,《创业注》所载,“军司以兵起甲子之日,又符讖尚白,请建武王所执白旗……帝曰:‘洙纣之旗,牧野临时所仗,未入西郊,无容预执。’”^①这一条的记载应当是真实且准确的,充分说明了李渊集团起兵执白旗的真实寓意。李渊集团身处南北朝以来的传统政治伦理和神秘政治文化的大背景之下,将“周武革命”政治范例中天命所赋予的正义性和神秘性充分发挥出来,以吊民伐罪作为其起兵的合法性根本依据,利用与之相配合的甲子日和执白旗传统,加以“白旗天子”、“桃李子”、“武得九九”、“以甲子附会李氏”等谣讖术数的神秘色彩渲染和舆论煽惑,从而系统地完成了起兵反隋的政治合法性构建。而白旗不仅是李渊集团反隋的醒目标识,也是政治合法性构成要素交汇的象征核心。

三

在陈寅恪的“突厥旗色尚白”立论中,是以李渊集团与突厥的关系为出发点,以此来审视李渊集团起兵反隋事件的。其中有两点是值得加以进一步探讨的,即与突厥的关系在李渊集团起兵事件中究竟处于何等位置,其次就是对于李渊集团执白旗“以示突厥”以及相关谣讖的史料考究。

陈氏认为李渊臣服突厥一事确凿无疑,所据仅是《旧唐书·李靖传》所谓太宗亲口所言。这一点李树桐已详加考证,认为是“史官(许敬宗)欲溢太宗之美而诬高祖”。^②至于陈氏以李仲文受封于突厥事逆推李渊亦应类同于此,则颇嫌武断。^③

早在起兵之前,李渊就意识到“历山飞不破,突厥不和,无以经邦济时也”^④。对于各地的“贼帅”起义者,李渊采取了军事镇压和纳降的手段,以之壮大了自身力量。但是对于突厥的威胁,李渊集团始终未有彻底的解决办法和明确的应对策略。最初李渊取得了一些小规模战事的胜利,但并未从根本上解除突厥的威胁^⑤,五月十七日突厥突袭太原事件将这一问题再次摆到了李渊集团面前。其后所发生重要事件如下:

- (1) 五月丙寅(十七日),突厥数万骑突袭太原。
- (2) 五月戊辰(十九日),突厥于太原撤兵。^⑥
- (3) 五月己巳(二十日),李渊遣使,送手书与突厥始毕可汗。

①④ 《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第11、3页。

② 详见李树桐:《唐高祖称臣于突厥考辨(下)》//“大陆杂志史学丛书”第二辑第二册《唐宋附五代史研究论集》,台北:大陆杂志社,1967年,第100页。

③ 详见陈寅恪:《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寒柳堂集》,第114—115页。另,《资治通鉴》卷一八八载,李仲文为并州总管时,“赃贿狼籍”,“应桃李之谣”(第5904页),并勾结突厥,私受“南面可汗”之封,欲引之南下。其事出自可朱浑定远和唐俭的举发。然而两《唐书》并不见上述细节的相关记载,《册府元龟》卷九二二“妖妄”关于此事亦无李仲文与突厥相勾结的记载(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0888页),故《资治通鉴》所载颇为可疑。又,武德三年“六月,处罗至并州。总管李仲文出迎劳之,留三日,城中美妇人多有所掠。仲文不能制”(《旧唐书》卷一九四上,《突厥传上》,第5154页)。而其后任“刘世让检校并州总管时,突厥可汗遣俱特勒以所部千人居我并州,甚为民众。前总管李仲文不能制,世让到官,以计擒之,驰使以闻。高祖大悦,嘉叹久之”(《太平御览》卷三二六,《擒获下》,第1499页)。此外,李仲文又是“魏密之从父也,以密反于荥阳,缘坐亡命,招集无赖,抄劫郡县之间”(《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中,第34页)。故颇疑李仲文因并州总管任上处理突厥关系失当,且赃贿狼籍,加之其为李密叔父的身份,而终遭李渊猜忌。其勾结突厥并受封一事,或为罗织,不可尽信。以此逆推李渊称臣受封于突厥,则失于武断。

⑤ 《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所谓“突厥丧胆,深服帝之能兵,收其所部,不敢南入”(第2页),当为夸大之辞,否则也不会有五月十七日突厥直接攻打太原之事发生。《资治通鉴》记载为“前后屡捷,突厥颇惮之。(胡注:前后屡得小捷耳。曰颇惮者,未深惮也”(卷一八三,“隋纪七”,第5717页)。

⑥ 《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作“己亥”(第8页)。此月无己亥日。李树桐认为当为乙亥日,亦误(见《唐高祖称臣于突厥考辨(上)》//“大陆杂志史学丛书”第二辑第二册《唐宋附五代史研究论集》,台北:大陆杂志社,1967年,第93页)。按《创业注》所载,突厥于丙寅日袭太原,两宿而退,《资治通鉴》亦载,突厥“留城外二日大掠而去”(卷一八三,“隋纪七”,第5735页),故知此日当为“戊辰”。又,李氏亦对双方关系进行了时序排列,然而此处乙亥之误,使得随后时序错乱,与史籍所载难以印证。另,气贺泽保规亦指出了《创业注》中的几处时间错误(包括此处及“六月己卯”的错误等),详见《〈大唐创业起居注〉的性格特点》//《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六朝隋唐卷》,第236页注10。

- (4) 五月乙亥(二十六日),突厥回书至,同意相助,要求李渊“自作天子”。^①
(此后三日,李渊犹豫不决,与裴寂、刘文静等讨论。)
- (5) 五月己卯(三十日),李建成、元吉至太原。李渊决心公开反隋,遣使答复突厥。
- (6) 六月癸未(四日),始毕遣康鞘利等,送马千匹来太原交市。
(六月甲申(五日),命李建成、李世民率众攻打西河。)
(六月癸巳(十四日),正式置左右三军,设大将军府,任命属官。)
- (7) 六月丙申(十七日),康鞘利并马至太原。
- (8) 六月乙巳(二十六日),康鞘利还蕃。李渊命刘文静报使,以取突厥兵。
(七月癸丑(五日),李渊“仗白旗而大号誓众”,正式起兵。)
- (9) 七月丙寅(十八日),突厥遣使至灵石贾胡堡,先报已遣兵马上道。
- (10) 八月癸巳(十五日),刘文静、康鞘利率突厥兵至,会于龙门县。

以上据《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并参考《旧唐书》卷一、卷五十七,以及《唐会要》卷九十三等史料而成^②,以李渊集团与突厥的关系变化为编排主线,其余事件间列其中。其中一些事件值得我们加以重视。

首先,李渊集团的政治、军事准备中始终是将反隋放在首位的,即便是妥善解决突厥的威胁已成为当务之急,也没有打乱其既定的反隋计划实施。

如上列条4、条5,突厥要求李渊“自作天子”,公开反隋的态度。李渊则表现为犹豫抑或是拖延,直至按其原定计划李建成、元吉安全到达太原,解除了心腹之忧,才断然公开反隋。又如,在与突厥建立同盟关系过程中,突厥使者康鞘利送马至太原(条7)和率兵会于龙门(条10)是两个重要节点,标志着与突厥关系的初步改善和最终明确。但在此间,李渊集团没有坐等突厥的反应和行动,没有停止既定的反隋计划实施,果断完成了攻破西河以试兵锋、建军开府和南下进军战略步骤,从开始与突厥改善关系的五月二十一日(条3)到正式南下出兵的七月五日仅仅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这既反映了李渊集团的战略远见,也说明与突厥的关系仅仅是其整体战略安排中的一个次要的、权宜的部分。因此,作为周隋以来关陇贵族集团中坚力量的李渊家族是有着巨大的政治野心和明确的战略目的的,在根本上不同于刘武周等北方割据势力^③,将此二者进行类比以推测李渊集团亦接受突厥的白旗或狼头纛是不正确的。

其次,李渊集团与突厥的同盟关系是建立在现实的短期利益基础上的,因而是暂时的和不稳固的。

该同盟关系的建立经历了最初的试探(条3中李渊表明吊民伐罪的意图和对突厥“子女玉帛”的承诺)、结盟条件的达成(条5李渊同意反隋自立,突厥许诺助以兵马)、盟约的初践(条7康鞘利将马至太原交市,李渊获得战马,突厥取得货利)、同盟关系的确立(条10刘文静引突厥兵与李渊会于龙门)等一系列过程。就李渊集团而言,其与突厥结盟是为了获取南下进军时后方的安定,这是其主要目的。该目的以刘文静在突厥的外交活动而得以实现,标志和保证就是引突厥兵参与南下

① 该时间的推断依据为《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所载“使人往还,不踰七日”(第9页)。下条六亦据此推断。

② 《旧唐书》卷一载,“(五月)甲戌,遣刘文静使于突厥始毕可汗,令率兵相应”(第3页)。《册府元龟》卷七载,“于是斩威、君雅以谢太原百姓。乃遣刘文静连和于突厥”(第76页)。则此二记载与《创业注》颇不同,认为刘文静出使时间在李渊与突厥建立联系的最初,而非《创业注》所载,为三次遣使中的第三次。然而,《创业注》中所载前两次与突厥联络中仅言“遣使”而未提刘文静之名。以刘文静地位之重要及《创业注》对其诸事记载颇详来看,未录其名则意味着其未参与其事。此外,刘文静《旧唐书》卷五十七本传所载,其出使借兵正符合《创业注》中所载第三次遣使的目的。又,《创业注》卷一载,康鞘利送马还蕃为六月乙巳,刘文静与其一同至突厥报使。乙巳前一日为甲辰日,故疑李渊于六月甲辰命其出使,而于次日与康鞘利一同出发。《旧唐书》卷一所记甲戌或为甲辰之误。

③ 如,李渊集团认为刘武周是“事胡者”,自视与之不同。见《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二,第26页。

攻隋，但李渊集团始终对突厥势力心存疑虑，这也体现了该同盟关系的暂时性特点。^①此外，结盟还具有借助突厥势力震慑关中和从突厥获取战马的目的，兹不赘述^②。

由上可知，李渊集团在起兵之前的谋划中并未将突厥问题加以重视，其战略构想是自晋阳迅速出兵南下，攻取杨隋腹心之关中，故其不同于刘武周等意图割据北方的军阀势力，没有必要付出较大的代价与突厥建立长期稳固的同盟关系。五月十七日突厥突袭太原，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李渊集团的恐慌，使其不得不将同突厥的关系问题加以重视，故有了此后的与突厥的书信往来，双方正是在此过程中互相试探，提出各自的政治要求，谋取所需的实际利益。在此过程中，李渊集团反隋的政治、军事准备和计划实施并没有被打断。双方的结盟关系随着通使和马匹交易而逐步加深，但始终并不稳固，直至刘文静出使突厥借兵的外交活动的成功才使得双方的结盟关系得以最终确立。

四

在结盟过程中，李渊集团为取得稳固的战略后方而示好于突厥，故有所谓“改旗帜以示突厥”之举，这也是陈氏立论的证据之一。但这里用来“示突厥”的，仅仅是指变异隋代绛色旗色以示反隋决心于突厥而已，并不意味着是执突厥之白旗，上列条4、条5之事在《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中已叙述颇详^③。另，《旧唐书》卷五十七《刘文静传》载：“（刘文静）劝改旗帜以彰义举，又请连突厥以益兵威”，也说明了“改旗帜”与“连突厥”并非一事。

此外，目前有关东突厥的史料和专著中并无其旗色尚白的记载和研究^④，史载李渊起兵之前与突厥相勾结的割据势力如刘武周、梁师都、李子和等人都是接受突厥“可汗”或“天子”封号和狼头纛，并无易帜为白的记载^⑤。因此，所谓“童子木上悬白幡，胡兵纷纷满前后”的讖语应当也是概述了李渊反隋自立和引始毕可汗突厥兵相助之事^⑥，是李渊起兵反隋成功所执行的两大策略，对此陈氏的解释也是基本合理的。但其进一步将此讖语合并起来进行具体化的解释，将所悬白幡解释为突厥之白幡，认为李渊携突厥兵和突厥旗色以壮声势，则有失牵强。如前所论，李渊集团始树白帜的时间，当为五月己卯（三十日）决心反隋至六月甲申（五日）出兵西河之间，此后七月癸丑（五日）仗白旗誓师出兵以及南下的重要军事行动中，都是没有始毕可汗的突厥兵参与的，其五百人的突厥小部队

① 刘文静自出使突厥直至引突厥兵至龙门，时间长达近五十日，其中在突厥中的交涉活动至少达到月余，对于李渊集团南下战略的实施可谓功绩卓著。如事后李渊就称赞“非公善辞，何以致此”（《旧唐书》卷五十七，“刘文静传”，第2292页）。但该结盟的不稳定性始终困扰着李渊集团。如进军霍邑途中受困贾胡堡，时已闻突厥兵马将至，但“刘文静之使蕃也来迟，而突厥兵未至。时有流言者云：突厥欲与武周南入，乘虚掩袭太原”（《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二，第26页），造成了李渊集团的恐慌。此外，李渊也因突厥“少信而贪利”，反复向刘文静强调借其兵当使“马多人少”。

② 《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二载，“癸巳，至于龙门县。刘文静、康鞘利等来自北蕃，突厥五百人，马二千匹，从鞘利等至。帝喜其兵少而来迟，藉之以关陇，谓刘文静曰：‘吾已及河，突厥始至，马多人少，甚愜本怀’。（第30页）

③ 详见该书卷一所载“兴国寺兵”事以及裴寂、刘文静等人的公开反隋建议（第10页）。

④ 如《隋书》卷八四，“突厥传”，以及《北史》卷九九，“突厥列传”等均无此记载，专著如薛宗正所著《突厥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马长寿所著《突厥人和突厥汗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吴玉贵所著《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林幹所著《突厥与回纥史》（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等以及有关突厥碑刻文献中，均无突厥旗色尚白的记载。气贺泽保规在上引文中亦因此对突厥旗色尚白表示怀疑（第222—223页）。又，《新唐书》卷八〇“常山愬王承乾列传”载：（李承乾）“好突厥言及所服，选貌类胡者，被以羊裘，辮发，五人建一落，张毡舍，造五狼头纛，分戟为阵，系幡旗，设穹庐自居。使诸部斂羊以烹，抽佩刀割肉相啖。”“又覆毡为铠，列丹帜，勒部阵，与汉王元昌分统大呼，击刺为乐。”（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564—3565页）李承乾仿突厥语言服饰，居毡帐，建狼头纛，可见其受突厥文化影响极深，却又列丹帜，此或可反证突厥旗色并非尚白。

⑤ 详见《新唐书》卷八六（第3712—3713页）、八七（第3730—3731页）、九二（第3804页），上述诸人本传。

⑥ 气贺泽保规对“胡兵纷纷满前后”解释为突厥袭太原之事，则与该讖语用来劝进的作用不合。见《〈大唐创业起居注〉的性格特点》//《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六朝隋唐卷》，第230页。

与李渊会于龙门县,已是八月癸巳(十五日)了,此突厥兵加入李渊集团无论其政治层面上的影响还是军事上的价值都是微乎其微的,其真正意义如前所述在于李渊集团与始毕可汗结盟中相互取信的象征价值。现实中,始毕之胡兵并非“纷纷满前后”^①,则白幡与始毕之间的所谓必然联系也是难以解释的。

陈文中认为《创业注》中对易帜为白一事语焉不详,辞费文繁,是“温氏曲为唐讳之苦心”^②。然而从上文中可知,《创业注》中对李渊集团与突厥结盟之起因、通使致书之细节、结盟巩固之步骤等都有着较其它史书更为细致的描述。如须隐晦,何必如此。

以上可知,陈文的论证并不严密,推论较多,对该问题的探讨仅从政治及民族关系角度着手,且文章的立意似以暗喻时事为主,该特点已为一些学者所指出^③,故其“突厥旗色尚白”的论点,着实不够严谨。

在上述几部分的论述中,单就李渊集团的易帜原因而言,似乎仅仅“请建武王所执白旗”的一条资料就可以解决问题了。但其易帜问题,不只是单纯的政治宣示活动,也并非如陈文所言仅关乎与突厥的民族、政治关系和利益的博弈,而是李渊集团起兵反隋活动政治合法性的综合构建过程,是包含着中国古代政治伦理的传统命题和中古时代所特有的思想文化诸元素的一个复杂的运行系统。其以对“武王伐纣”的正义性“天命”传统的追溯和继承为中心,以对“甲子”为核心和特征的神秘性术数“天命”的迎合为辅助,同时借助于南北朝以来流行的谣讖的传播方式和旧有内容,最终完成了以白旗为象征的政治合法性构建过程,而该构建过程的多元性特点,也是中古时代思想文化特征的集中体现。

(责任编辑:林日杖)

① 李渊起兵过程中,真正发挥重要作用的是东突厥贵族史大奈,相关事迹见《资治通鉴》(卷一八一,“隋纪五”,第5658页;卷一八四,“隋纪八”,第5741页)和敦煌写本S. 2078V“史大奈碑”(游自勇、赵洋:《敦煌写本S. 2078V“史大奈碑”习字之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30辑,第165—181页)。

② 《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寒柳堂集》,第112页。

③ 详见张耕华《陈寅恪、吕思勉治世风格的异同——以唐高祖称臣突厥之考辨为例》(《学术月刊》2013年第2期,第132—140页),及张文所引余英时《陈寅恪的学术精神和晚年心境》(收入余英时《现代学人与学术》,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一文。